

中国通史 之清史

六、内忧外患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后,中国不仅遭到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侵略,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革命运动,而且发生了空前的巨变。从此,清王朝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虎门销烟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下谕:诏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林则徐进京,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其节制。三天后,又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与林则徐通力合作,查禁鸦片,铲除祸患。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第二天,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林则徐在行馆门首张贴告示:严禁打点关税,严守关防,所有随从人员不准擅离左右,借故进出。这个告示表明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和认真的态度,使鸦片贩子无可乘之机。

林则徐决定分两步走,第一个步骤是了解鸦片流毒的情况。除了和邓廷桢会晤之外,他把有关的散商行商集中在行馆附近,日夜传询。很快,林则徐已完全了解了广州方面鸦片

走私和鸦片经营的情况。于是，他一面着手整顿水师，一面进行第二个步骤：收缴鸦片。

二月初四，林则徐召集贩卖鸦片的行商，宣布谕贴。命令所有外商三天内将鸦片造具清册，等候收缴，并用汉文和外文立下字据，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一经查出，一律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立下誓言：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发誓与之斗争到底，绝不中止禁烟行动！

卑鄙的外国毒贩虽有畏惧之心，但在英国老毒贩颠地和英侵略者代表义律的教唆之下，还抱着观望态度，希望能有机可乘。

林则徐早已预料到毒贩们不会善罢甘休。在公布缴烟的命令的次日——二月初五，就命令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以备防范。二月初八日，三天期限满了。毒贩们企图蒙混过关，只肯呈缴一千余箱鸦片，当即被林则徐所拒绝。与此同时，林则徐宣布如外商违抗政令，当即对停泊在黄埔的各国商船进行封舱，不准上下货物进行贸易。同时，下令人民不准将房屋、船只租给外商，所有外商雇佣的中国人员一律撤出，而且又派兵包围了外商洋行。初十下午起，二百七十五名外商完全被隔离。

毒贩的阴谋没能得逞，“隔离”使他们尝到了林则徐执法严明的滋味。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一面派员痛斥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的罪行，一面发出《示谕夷从速缴鸦片烟土四条》，从天理、人情、国法、时势四点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二月十三日，义律终于妥协，作出表示服从清政府的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PDF请访问：www.e18.com

定。

二十八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临虎门监视，第二天开始收缴，至四月初九日，鸦片全部收缴完毕。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二三月间，林则徐除了同外国毒贩斗争外，同时也加强了对内部的清查力度。二月初，他通令全省士、军、商、民人等迅速戒掉鸦片，限定广州一地自二月底到三月底止，各府州县在二月底以内，各家呈缴烟斗、烟枪等烟具，由所在地方有司负责，责令各学堂教官清查生员有无吸食鸦片与贩卖鸦片情况，查禁营兵吸食鸦片，编查保甲以断绝吸食鸦片。在各种条规和命令中，林则徐有计划有步骤的禁烟运动，受到广东人民的极力拥护与支持。

林则徐在鸦片收缴完后，呈请清朝政府如何处置。道光帝复命就地销毁，让沿海居民及居住广州的洋人亲眼目睹，以示朝廷的威慑力以及禁烟之决心。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公元1839年远月猿日），从这一天起，林则徐开始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销毁时，其设防相当严密。钦差大臣林则徐、广东提督关天培、两广总督邓廷桢事必躬亲，经常在虎门处理销毁事宜。

鸦片销毁程序极为繁琐，且时间消耗长，开始每天只能烧毁三四百箱，后增加至八九百箱。到五月十五日，鸦片全部销毁完毕，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价值三千四百万元。

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的虎门销烟，是整个禁烟运动的高潮，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全世界，尤其是向英帝国主义者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

鴉片戰爭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三月,当义律被软禁于广州商馆时,曾致信英国政府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要求实施军事手段,重新调整中英商务、政治关系。

英国内阁于八月二十四日(八月 廿日)决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正月,巴麦尊在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训令中,明确了封锁广州及中国沿海口岸、要求赔偿、占领舟山、订立条约、割让岛屿等侵华作战以及外交方针,并下发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向中国提出了以上各种无礼要求。五月二十二日(五月 廿日)起,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州珠江口外,共有军舰十六艘、武装轮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七艘,载运地面部队四千人。

但是,清王朝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认为禁烟运动已经大功告成,只需了结善后事宜即可。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公元 1839 年 12 月 1 日),他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卸去他的钦差大臣一职,希望恢复平日状态。

负责中英交涉事务的林则徐等人,也错误估计了敌情。他们虽然曾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采取行动,但以为义律等人只能私下调动二三艘军舰来华。为此,他们在广东的虎门、九龙、尖沙咀一带加强防御,以静制动,等待时机。如此这般的敌情判断,使清王朝在毫无军事、财政以及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卷入这场战争的漩涡之中。

六月初四,一艘英舰来到厦门,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

书》,由于这种方式不符合清朝体制,自然为当地清朝官员所拒,于是炮战打响了。这一天,英舰五艘驶至定海。初七日,英军进攻定海,经过九分钟的炮战,港口一带的清军防御被击溃,英军占领县城。此后,英军以定海作为据点,向镇海进逼,并向浙江当局递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遭到当地官员的强烈拒绝。英军遂封锁宁波、长江口、厦门,兵犯乍浦,并北上天津海河口。至此,英军的第一步作战计划,即占领舟山、封锁海口,已经基本实现。

由于当时通讯工具极为落后,清廷接到消息的次序也是颠倒的。六月二十二日,道光帝收到定海沦陷的奏报;七月初四日,收到林则徐的上报,来华英舰船十一艘;初五日,收到乍浦、厦门军事冲突的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帝最初还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夷售烟图利”,因广东断其贸易而“分窜各路,肆行扰害”而已。十四日,英军抵达天津海河口外。十八日,琦善奉旨接受英国文件,即《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至此,清廷才如梦初醒。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意义不一般。它一半的篇幅是为英国商贩开脱罪名,指责林则徐软禁英国鸦片商人的粗暴无礼行为。然而,这份重要的文件的译文与原文有很大出入,尤其是第一句,将“要求皇帝纠正错误和赔偿”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文中还多次将“要求”译成“求”,将“充分赔偿”译成“尽行伸冤”。

这种卑微的言语,正合清王朝之意,使道光帝将两国之间的交往,当成了告御状。他在对《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详细披阅”之后,将英方的要求误解为“乞恩”(各项要求)、“昭

雪（ 惩办林则徐 ）两部分。于是，他站在一视同仁的立场上，宣布林则徐没有履行公正的原则，将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秉公查办。英军不熟悉北方的地理形势和清军的筹防情况，事先在山海关打探了一下虚实后，于八月十九日南下广东。

道光帝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即由主“剿”转为主“抚”。

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 1840 年 8 月 21 日），道光帝任命琦善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负责进行中英谈判。九月初三日，琦善以办理不力为借口，将林则徐、邓廷桢交有司严加议处（后革职）。先前奉命进剿定海英军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遂与定海英军谈判，十月，英军宣布浙江停战。

琦善于十一月抵达广州，与义律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他向英国承诺赔款六百万银元，并决定除广州外，另辟厦门为通商口岸。但是，这些千里迢迢前来的“英夷”远非琦善所想像的那样容易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义律坚持以巴麦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为谈判基础，并以武力威胁清廷。

琦善到任后，十分鄙视广东的防务，根本不出力经营。当谈判不能再继续下去时，他曾增兵虎门，但只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洋人知道我们有备而来”。十二月十五日，英军为使琦善屈服，以军舰七艘、轮船四艘、登陆部队约一千四百人，攻破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

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几次接到琦善的奏折，奏折上说英国很难对付，瞧不起中国官员。道光帝大为震怒，决计主“剿”，向广东调派援军一万二千余名，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湖

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 ,前往广东围剿英军 ,并令沿海各省加强防御。

此时琦善尚未接到谕旨 ,虽在沙角、大角战败后 ,调兵增防各处要地 ,但是在谈判中还没有获得主动权。义律照会琦善 ,称英军交出沙角、大角 ,撤往香港 ;同时单方面发布文告 ,公布了与琦善签订的协定内容 :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中英平等交往、中英即将恢复贸易 ,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 1841 年 1 月 26 日) ,英方在没有取得清政府允许的条件下 ,正式占领香港。与此同时 ,定海英军也开始南撤。

英军占领香港后 ,义律与琦善两次会谈 ,但仍无实质性的进展。正月二十二日 ,义律将其所拟《条约草案》七条送至琦善处。二十五日 ,又照会称五天之内若不盖印了事 ,将再次动用武力。

琦善此时收到道光帝选将派兵、决计主“ 剿 ”的谕旨 ,才知道道光帝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立即谎称患病 ,并故意推迟中英谈判。而义律亦得到了道光帝要求开战的情报 ,知道谈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二十七日起 ,英军舰队在虎门一带集结。二月初三日 ,英军进攻虎门主阵地后侧的三门水道。初六日 ,英军攻破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挡一线各炮台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身殉国。随后 ,英军上溯珠江 ,沿江而上 ,接连攻陷了乌涌、猎德、琶洲、二沙尾等处炮台。二十六日 ,英军攻陷广州南珠江上的海珠等炮台 ,兵临城下。

三月二十三日(源月 15 日) ,靖逆将军奕山等人抵达广州。由于道光帝支持对英作战 ,杨芳、奕山等积极筹备战事。

广州在停战一个月后 ,形势再一次恶化 ,英军舰队亦重入珠江。闰三月二十九日 ,奕山等令清军以火筏偷袭停靠在珠江上的英军舰船 ,却未能成功。四月初一日 ,英军击毁清方船筏七十五只 ,截留商船盐船一百四十余艘。初三日 ,义律发出通告 ,限奕山等在十二小时内将清军撤出广州 ,遭到奕山的拒绝。初四日 ,英军右纵队约三百六十人攻占广州城西南的商馆 ,左纵队约二千四百人 ,避开城东和城南清军防守较严地区 ,在城西的缙步一带登陆。初五日 ,登陆英军攻占城北观音山(今越秀山)诸炮台 ,广州城完全处于英军的炮火之下。第二天 ,奕山等就竖起白旗 ,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求和。义律提出如果要停战 ,必须答应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 ,奕山等在六天内率军出城至二百里外 ;第二 ,七天内交赎城费六百万元 ;第三 ,七天内赔偿被焚商馆等处的损失。奕山答应了义律的条件。

就在中英广州停战的次日 ,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举行了抗英斗争。先是林则徐、奕山、杨芳等人 ,在广东珠江下游一带倡办团练 ,当地士绅负责调集民力组成队伍 ,原先就有的“社学”等民间组织也四处活动 ,使广州北郊一带的民众结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四月初九日 ,英军在三元里一带抢掠 ,淫及老妇 ,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二天 ,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的民众 ,包围观音山一带英军据点。英军出击 ,被引至牛栏冈一带 ,被歼五人 ,伤二十三人。十一日 ,数以万计的民众再一次冲进英军营地。英军以攻城威胁清方官员 ,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遣散民众。

四月十一日 ,广州清军撤往城外。第二天 ,清方的赎城费

也大体交清。根据停战协定 ,英军开始从广州城北撤退。至十八日 ,英军交还各炮台 ,向香港撤退。奕山等人再次上奏 ,谎称广东省对外事务已解决 ,要求撤退外省援兵(此时实际上已成为扰害地方的溃兵)。

在谎言的掩饰下 ,战争似乎结束了 ,天下似乎太平了 ,奕山等人亦相安无事了。但是 ,就在各省准备撤防之际 ,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爆发。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 1841 年)春 ,英国外相巴麦尊看了《穿鼻草约》后 ,野心未能满足 ,认为所获权益太少 ,决定召回义律 ,改派璞鼎查全权负责。六月二十四日 ,在清朝沿海的一片撤兵声浪中 ,璞鼎查到达澳门。璞鼎查认为 ,要使清朝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必须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 ,把战火引向北方。他于七月初五日命英军一部留守香港 ,自率主力(军舰九艘、轮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二艘 ,陆军二千五百人)北上 ,向厦门进逼。

十七日 ,英军发动进攻 ,突破清军的防线 ,当日占领定海。守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战死。道光帝于九月初四日下令授奕经为扬威将军 ,率领大军与英军决一死战。

从九月十五日出京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奕经方至杭州 ,沿途三个半月 ,虚张声势 ,号称率十三万大军来浙 ,以震骇英军。正月二十二日 ,他进抵前线慈溪 ,手中已握有一万名从各地调来的援军和大量雇佣军。据私家记载 ,他由于梦见英军弃陆登舟 ,联帆出海 ,便认为马上就可以收复失地 ,便下令于二十九日四更时分 ,即所谓“四寅佳期” ,清兵分三路反攻宁波、宁海、镇海的英军 ,结果大败而归。

此时 道光帝经过几番受挫之后才醒悟过来 眼前所面临的“ 区区岛夷 ”,竟是清王朝前所未遇的悍敌。他也突然发现 ,自己对于这个敌手 ,一点儿也不了解。

道光帝的态度转变 ,并不意味着向英国妥协 ,也并不意味着打算立即向英国求和。他只是企图在一定限度内作出退让 ,也就是实行所谓的“ 羁縻 ”政策。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元 1842 年 源月 苑日) ,道光帝命耆英担任钦差大臣。三月初五日 ,耆英、伊里布出京。二十九日 ,耆英到达杭州 ,开始按照道光帝的预想筹备军务。与此同时 ,英军又开始实施新的作战计划。

英军在浙江度过了一个冬季之后 ,他们准备发动长江战役 ,攻占位于长江和大运河之交的镇江 ,切断清政府的漕运 ,迫使清政府投降。

四月三十日 ,英军到达长江口外 ,顺江而上 ,逼近清军重兵设防的吴淞口。五月初八日 ,英军突破吴淞防御阵地 ,攻陷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 ,两江总督牛鉴不敌英军 ,抱头鼠窜。接着 ,英军未遇抵抗 ,又进占上海。

二十八日 ,英军放弃上海 ,调集大量兵力 ,沿长江西进。六月十四日 ,以六千余人进攻镇江。守军奋力抵抗 ,英军付出了巨大代价 ,攻陷镇江。至此 ,清军精心筹防的地区 ,已完全被英军攻破 ,形势越来越危险。

六月十九日 ,道光帝接到镇江防守不力的奏报 ,密谕耆英 ,为了维护大国的威严 ,对洋人的要求作一下变通 ,答应中英平等交往、割让香港、闽浙沿海开放通商口岸三项要求。第二天 ,他得知镇江失守 ,授权耆英、伊里布根据具体情况采取

相应的措施。二十八日起 ,英军舰队继续驶抵南京城下 ,勒索赎城费。耆英、伊里布一心想与英军议和 ,也一路尾随至南京 ,以“ 钦差大臣 ”的身份 ,与英国人开始谈判。

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 1840 年 愿月 愿日) ,清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登上停在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军旗舰“ 皋华丽 ”号 ,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鸦片战争 ,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且打开中国的重要步骤 ,也是他们将中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古老的中华民族 ,从此便走上了屈辱的历史道路。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共有十三款 ,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 ,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进行通商贸易 ,英国可以在上述五口岸派驻领事 ;第二 ,割让香港给英国 ;第三 ,赔偿鸦片烟价六百万元 ,行商欠款三百万元 ,英国远征军费用一千二百万元 ,共二千一百万元 ;第四 ,废除公行制度 ,允许自由贸易 ;第五 ,赦免战争期间为英国卖命的中国人 ;第六 ,重新订立进出口关税 ;第七 ,中英官员保持平等往来。

从上述内容看 ,割地、赔款两条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赦免汉奸一项 ,对中国内政横行干预 ;废除公行、增加通商口岸、新定关税 ,虽符合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扩张的利益 ,但对中国现状不无帮助 ,通商有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 ,也必然促进国内的生产和消费 ;至于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它冲击

了天朝对外体制 ,是不幸中的万幸。

八月十五日 ,璞鼎查、耆英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中英虎门条约》,该条约另有附件名为《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在这些条约中 ,英方满足了清政府密切关注的五口以外不得通商游历、清政府不再赔偿商人欠款等几项条款 ,而这几项条款并不需要清政府承担任何义务 ,而又在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几项至关重要的权利。

第一 ,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第十三款规定 :“倘遇有交涉诉讼……其英人如何治罪 ,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交给管事官照办。”这就表明侨居中国的英国人完全脱离了中国法律的限制。

第二 ,丧失关税主权。关税本属内政 《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将几十类百余种进口货物的关税用两国条约的方式规定下来 ,清政府也就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 ,中国改变关税的权力受到侵犯。

第三 ,片面最惠国待遇。《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条在载明英国无意私自霸占新设通商口岸的贸易权益后面增添了一句 ,如果将来清政府对其它各国恩惠的话 ,英国人也有权享受 ,这样才表明态度公允。这一条就给了英国片面最惠国的待遇 ,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四 ,英国军舰有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的权力。《中英虎门条约》第十款称 :“凡通商五港口 ,必有官船一只在彼湾停泊 ,以便将各货船水手严行约束 ,该管事官亦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由此 ,英军可以在各个通商口岸的港口任意停靠 ,而这些舰船并不是为了约束本国商民 ,反成了镇压清政府

官员的武力工具。

然而,事情没有如此快速解决,美国、法国又接踵而至。

美国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美国总统当即作出反应,他向国会报告了此事,并提议拨出专款,作为驻华委员的费用。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国会接受并采纳了总统的提议。美国政府马上派专使顾盛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三艘军舰。

五月十八日(公元1843年苑月猿日),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以《中英虎门条约》为蓝本,共三十四款。美国因此而获得了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片面最惠国待遇、官员平等交往、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一系列的权益。实际上,除赔款、割地两项外,这几项权益与英国获得的权益基本相似。

中法谈判,是中美谈判的续曲。军舰和觐见,再次成为迫使清政府妥协让步的利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44年 员园月 圆原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与法国专使拉萼尼(蘧朝肇伊)在广州城外的黄埔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还有特别的条款,即在通商口岸“法兰西亦可建造礼拜堂……倘有中国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侵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从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二十年的基督教,再次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可以说《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并不是因鸦片战争而导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而是英、美、法三国国抓住清政府在新败之后产生的恐惧心理,利用清

政府对国际法则的无知 ,威胁清政府妥协酿成的恶果。这是西方列强丑陋嘴脸的有力证据。

在鸦片战争中 ,英国用大炮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它标志着“ 闭关锁国 ”的结束和近代化进程的来到。但是 ,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中 ,有着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西方人 ,有着受到协定关税保护的西方商品 ,有着可以自由驻泊的西方炮舰 ,它给在近代化道路上行进的中国人带来了无比的艰辛和困苦。

源缘 上海租界的出现

租界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形成的 ,最初是以外侨居留地形式出现。鸦片战争结束不久 ,璞鼎查即亲自或派员前往上海 ,勘查情况 ,以选择居住地。《中英虎门条约》第七款规定 ,各通商口岸“ 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根据地方民情 ,决定于何地方 ,用何房屋或基地 ,系准英人租赁 ”。就这个条约 ,清朝官员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进行了两年的谈判 ,双方制定了关于上海租界的第一个法律条文——《上海租地章程》,将现上海外滩一块土地作为英国人租赁建房的地方。

《上海租地章程》制定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 年)十一月 ,它虽是以《中英虎门条约》为根据而制定的 ,但英方故意曲解其中的有关规定 ,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

它规定了租界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承认英国领事在租界内拥有对土地租赁的权力 ;外商对土地有永远租赁权 ;华人不得在租界内地建屋。条款中还包括 :租界内应为公众修补桥梁 ,扫除街道 ,添置水龙 ,添点路灯 ,种树护路 ,雇募更夫 ,开沟

放水 ,其各项费用由租户与领事会商榷 ;修路等费用 ,最后由大家共同摊派 ,其决定权都在领事会选派的“ 正直商人三人 ”手里。通过上述规定 ,英国利用清政府的愚昧 ,逐渐在租界建立了由他们自己管理的决策机构和市政管理机构 ,形成了“ 国中之国 ”的局面。

英国将租界的势力范围加以扩大 ,到十九世纪末 ,发展到包括现今上海黄浦、静安、卢湾、虹口、徐家汇等区的绝大部分。面积由最初的八百三十亩 ,经过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的多次非法或合法的伸张 ,达到了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

上海租界内也居住着大量买办和华商 ,这就使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获得了大量资金 ,建起了有别于内地的中西结合 ,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色彩的城市。

缘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极大地震惊了广东士人 ,他们集结在府学明伦堂 ,发布《全粤义士义民公檄》 ,这篇檄文是由外籍落第士子钱江等人草拟的 ,表示与“ 英夷 ”势不两立。

二十三年七月 ,广州宣布开放 ,接下来的是一系列的请愿、集会、张贴告示等活动。群情激愤 ,连官府也无力镇压。官府只得暂时拖延英人入城的时间。钦差大臣耆英致函此时已被任命为驻华公使、香港总督的璞鼎查 ,称“ 广东的民风不能和江浙一带相比 ,刚刚经历战火 ,容易产生激变 ” ,等他“ 开导 ”后 ,然后再讨论进城的事。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耆英等人将英人将入广州的告示张贴出去 ,当日就被恼怒的民众撕个粉碎。次日 ,反对英人

入城的揭帖、告白到处都是，警告英人若进城一步，杀无赦。十八日，广东民众得知广州知府刘浚与英人商谈入城的事后，掀起了更强烈的怒潮。刘浚回城后，一些人呼喊英人已随知府坐轿入城，更多的民众持刀带械，纷纷聚集，以搜寻英人作为借口，冲进知府衙署，烧掉刘浚的官服。在如此大的反对怒潮之下，耆英也只好罢免刘浚。十九日又再次向人民作出保证，一定不会做有悖于民众意愿、顺从外国人入城要求的事情。耆英等人从此看到了民众的厉害，而民众亦从此看轻官府。二十一日，耆英照会英国人德庇时，说自己已无能为力，不能够再为他们入城的事出力了。德庇时也只得将入城的事暂时放在一边。二十六年三月，德庇与耆英在虎门签订了《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第一款里称：这次地方官没能管制好广东省士民，所以暂且先缓一缓，待到时机成熟后再予以商办，准许英人入城，虽然是暂时延缓，但断然不能废止。

连续几年办理外交且圆滑的耆英有时也感到棘手。两年后入城的许诺，更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剑。于是，他只得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提出了内调的要求。二十八年正月，道光帝调耆英回京，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差不多与此同时，文翰接替德庇时出任驻华公使、香港总督。

二十八年五月，文翰照会徐广缙，提出入城。

二十九年正月，徐广缙与文翰在虎门会谈，徐文缙以民众强烈反对为由又一次拒绝了英人入城的要求，但双方达到一项协议，由徐方缙上奏请旨，于三月十三日前答复。

比起耆英来说，徐广缙明显地偏向民众，但即使是这样，战争的阴影还是让徐广缙感到恐惧，他在奏章中称：如果拒绝